



FOCUS

高层动态

2020年7月27日

兰瑞智库
经济战略研究

指点江山

思入风云

菩提明镜

大道之行

主办：兰瑞智库经济战略研究中心

<http://www.runwaysys.com>

全国客服热线：4001182162

E-mail: runwaysys@188.com

在中国的国情下，中央高层的行为、语言、倾向，会对政策、宏观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中国，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必须把握政经趋势，而把握政经趋势，最不确定性的因素、最难把握的是中国的国情，而可能破解这一难题的，正是对中央高层动向的动态分析。

哪些问题受到高层关注？哪些人的思想在影响高层的决策？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又该如何采取针对性措施？

本报告力图提供一个关键性的分析框架，将中央高层动向及其影响分析与政经趋势分析相结合，从而达到把握最重要的决策要点的效果。

本报告力求提供的参考意见是有价值的，望您善加利用并慎重决策。



本期目录

最新动向	3
【习近平：千方百计保护好市场主体】	3
【习近平：深入实施东北振兴战略】	4
【国务院：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措施】	6
【李克强：谁敢动保基本民生公共资金 严惩不贷】	7
【汪洋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	8
【汪洋：破除湾区创新要素流动制约】	8
【韩正：坚持“三稳”目标 落实长效机制 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9
【胡春华：确保农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10
【胡春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10
问题探射	11
【中国低收入人口知多少？】	11
【房地产和基建升温 消费成短板怎么办？】	13
【政策中期效果同样重要 警惕疫情影响金融稳定】	17
人物关注	19
【省部级干部调整，龚正当选上海市市长】	19
智囊高参	22
【刘元春：疫情长期化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再定位】	22
【李国平：“十四五”期间需要制定差异化的区域政策】	25
虎视寰球	27
【英国“殖民迷思”何时休】	27
【美国关税“大棒”没砸动欧洲】	28
华夏透视	30
【上调中国 2020 年 GDP 增速预测】	30



最新动向

为什么要对中央高层的最新动向紧密跟踪？因为他们的行为、语言、倾向，会对政策、宏观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必须把握政经趋势，而把握政经趋势，最不确定性的因素、最难把握的是中国的国情，而可能破解这一难题的，正是对高层动向的动态分析。对高端决策来说，高层动向的紧密跟踪是研究分析的关键性资源。

【习近平：千方百计保护好市场主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7 月 21 日下午在京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中国很多市场主体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习近平也就如何让市场主体不仅能正常生存，而且能够实现更大发展提出了四点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座谈会。丁薛祥、刘鹤、杨洁篪、黄坤明、尤权、王勇、王毅、何立峰出席座谈会。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负责同志，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港澳台资企业、个体工商户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上，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陈宗年，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宁高宁，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立，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姜滨，上海品海饭店总经理赵宪珍，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洪小文，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总裁赵炳弟等 7 位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就当前经济形势、保护市场主体、加强科技创新、深化企业改革、吸引用好人才、“十四五”规划建设等提出意见和建议。发言过程中，习近平不时就一些问题同大家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活跃。

● 努力把疫情损失补回来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经过全国上下共同努力，目前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发展呈现稳定转好态势，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情况比预料的要好。我们要增强信心、迎难而上，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争取全年经济发展好成绩。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应对疫情的人民战争，团结协作、攻坚克难、奋力自救，同时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物质支撑。



习近平向广大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港澳台资企业、个体工商户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各地区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支持市场主体的政策措施，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使广大市场主体不仅能够正常生存，而且能够实现更大发展。

● 企业家要同员工携手渡难关

习近平指出，企业家要带领企业战胜当前的困难，走向更辉煌的未来，就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要勇于创新，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勇于推动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重视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本投入，有效调动员工创造力，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要承担社会责任，努力稳定就业岗位，关心员工健康，同员工携手渡过难关。要拓展国际视野，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提高把握国际市场动向和需求特点的能力，提高把握国际规则能力，提高国际市场开拓能力，提高防范国际市场风险能力，带动企业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

●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非封闭运行

习近平强调，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Top](#)

【习近平：深入实施东北振兴战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吉林考察时强调，要切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深入实施东北振兴战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体现新担当，在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上实现新突破，在加快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征程上展现新作为。习近平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增强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抗风险能力。



习近平指出，明年我国将开始实施“十四五”规划。“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谋划好“十四五”时期发展十分重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们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深入研判、深入调查、科学决策。党中央正在组织制定“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议。习近平希望各地深入调研，聚焦面临的老难题和新挑战，认真谋划“十四五”时期发展的目标、思路、举措。

● 做实做优做强实体经济

7月22日至7月24日，习近平在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省长景俊海陪同下，先后来到四平、长春等地，深入农村、社区、科技园区、企业，就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推进东北振兴、谋划“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调研。

7月24日上午，习近平听取了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对吉林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希望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断开创吉林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在新时代吉林振兴中实现新突破、创造新业绩。

习近平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增强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抗风险能力。要把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实做优做强，把提升全产业链水平作为主攻方向，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产学研一体化创新平台。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发扬企业家精神，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打造好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推进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对接合作。

● 防返贫和产生新贫困

习近平指出，要抓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机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地位，深化农村改革。要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绿色农业，推进农村三产融合。要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体推进，推进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要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推进适度规模经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和产生新的贫困。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施好重大生态工程。

● 强调千方百计稳就业

习近平强调，要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千方百计稳定现有就业，积极增加新的就业，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突出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和城镇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改革，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均衡发展，维护教育公平。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制机制，加大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投入，



加强公共卫生队伍建设，推动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高效协同。要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高度重视生产安全。当前，全国防汛进入“七下八上”阶段，必须统筹抓好南北方江河安全度汛，切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习近平指出，要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组织建党和思想建党有机结合，把党的组织优势巩固好、发展好、发挥好。要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永葆初心、永担使命。要严格把好选人用人政治关、廉洁关、能力关，加强对敢担当、善作为干部的激励保护，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全面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健全基层减负常态化机制。要创新人才工作政策、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积极营造拴心留才的良好环境。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把政治生态建设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实现正气充盈、政治清明。

[Top](#)

【国务院：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措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7 月 22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补短板扩内需提升群众生活质量；确定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措施，促进增加居民就业和收入。

会议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是内需最大潜力所在和“两新一重”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稳住经济基本盘具有重要意义。要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重点，加强城市短板领域建设，围绕农民进城就业安家需求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水平。一要针对防疫和防汛防灾减灾中暴露出的问题，着力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和相关设施建设，提高城市预防和应对重大疫病的综合能力。科学规划和改造完善城市河道、堤防、水库、排水管网等防洪排涝设施，加强台风、地震、火灾等各种灾害防御能力建设。

二要着眼满足群众改善生活质量需求，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加大环保设施、社区公共服务、智能化改造、公共停车场等薄弱环节建设，提高城市发展质量。

三要针对大量农民到县城居住发展的需求，加大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完善县城交通、垃圾污水处理等公共设施，建设适应进城农民刚性需求的住房，提高县城承载能力。

● 完善公益项目资金保障机制

四要引导促进多元化投入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完善公益性项目财政资金保障机制，地方政府专项债资金对有一定收益、确需建设的公共设施项目予以倾斜。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建立公用事业项目合理回报机制，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积极引导开发性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加大中长期信贷支持。各地要加强项目储备和开发，逐步解决城市发展历史欠账。坚决防止搞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

五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进城农民就近打工就业提供机会。

● 引导劳动者合理有序经营



会议指出，今年就业形势严峻，灵活就业规模大、空间大，是稳就业的重要途径。要压实地方特别是市和区县政府责任，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取消对灵活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引导劳动者合理有序经营。一是鼓励个体经营。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纾困政策。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从事个体经营的，按规定给予创业补贴、担保贷款、税收优惠等支持。

二是支持非全日制就业。对就业困难人员、离校2年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从事非全日制等工作的，按规定给予社保补贴。

三是对网络零售、移动出行、在线教育培训、在线医疗等新就业形态实行包容审慎监管，激励互联网平台创造更多灵活就业岗位。

四是加强就业公共服务。适应企业灵活用工需要，发展零工市场。维护灵活就业人员薪酬、职业安全等权益，严禁拖欠劳动者工资。研究制定平台就业劳动保障政策。五是动态发布社会需要的新职业，开展有针对性培训，增强群众灵活就业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Top](#)

【李克强：谁敢动保基本民生公共资金 严惩不贷】

7月23日，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谁敢动保基本民生的公共资金、搞腐败，一经发现要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胡春华，国务委员王勇、王毅、赵克志出席会议。国务委员肖捷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监委主任杨晓渡应邀出席会议。

李克强说，过去一年多来，政府系统深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但还存在问题和不足，必须持之以恒推向深入。

李克强指出，应对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各级政府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强正风肃纪，强化求真务实、做到施政为民，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这是对政府执行力和工作作风的考验，是确保政令畅通的纪律要求。

李克强强调，要正风肃纪，加强资金使用监督，切实提高纾困政策落实的精准性、时效性。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使新增财政资金“一竿子插到底”、迅速落地见效。这是一场改革，既对利益格局进行重大调整，也可以防止跑冒滴漏、减少腐败风险。各级政府要坚决做到过紧日子，节用裕民、俭以养德，把钱用在刀刃上，全力支持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

李克强指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都是实打实干出来的，来不得半点虚假。面对困难挑战，必须求真务实、苦干实干，决不允许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决不允许搞不正之风。谁敢动保基本民生的公共资金、搞腐败，一经发现要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各级政府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真实客观反映情况，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善于用改革的办法破解难题、化解风险，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巩固精文减会成果，让广大基层干部心无旁骛抓工作。



【汪洋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

全国政协 2020 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 7 月 20 日在京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政协制度建设的重要论述和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制定全国政协协商工作规则，交流探讨政协协商的原则、内容、形式、程序和协商文化建设等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并讲话。

主席会议成员充分肯定中共十八大以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当前协商工作制度规则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大家认为，建立健全全国政协协商工作规则，是落实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的要求，是发挥人民政协这一具有中国特色制度安排优势的要求，是提高专门协商机构协商质量和水平的要求，对于克服协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彰显人民政协制度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大家认为，建立健全全国政协协商工作规则，应把牢政治方向，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在实践中探索完善，逐步强化协商意识、培养协商能力、提高协商实效。要拓展协商内容，围绕有关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开展协商，继续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议题，适当增加文化、生态等议题。要根据协商内容明确协商参加范围，注意发挥好民主党派、界别的优势作用，视情邀请界别群众参与协商，增强包容性。要丰富协商形式，在搞好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专题协商会、双周协商座谈会等协商活动的同时，大力推进网络议政、远程协商，积极探索谈心谈话、委员读书活动等协商功能。要营造协商氛围，弘扬团结合作、平等相待、兼容并蓄、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等政协协商文化，少一些照本宣科、多一些畅所欲言，做到协商就要真协商。要完善成果落实机制，丰富成果报送形式，健全成果办理、反馈制度，确保协商成果落地见效。

务虚会前，汪洋主持召开全国政协第四十次主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 8 月 25 日至 27 日在京召开十三届全国政协第十三次常委会会议，围绕“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协商议政。会议原则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 2020 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刘奇葆、董建华、万钢、何厚铨、卢展工、马飏、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杨传堂、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出席会议并发言。

【汪洋：破除湾区创新要素流动制约】

全国政协 7 月 22 日在京召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合作”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论述，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认识推进大湾区创新合作的重大意义，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维护稳定之基，以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和体制机制创新，破除影响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瓶颈和制约，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打造开放型协同创新高地，进一步丰富“一国



两制”实践内涵。

此次专题协商会采取现场会议和视频会议相结合的方式举行，100余位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等在全国政协机关主会场和广东、香港、澳门分会场参加会议，40多位委员和部分专家在会上发言，200多位委员通过移动履职平台发表意见。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铨、梁振英在会上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万钢、王正伟、马飏、夏宝龙、李斌、汪永清、苏辉、郑建邦、辜胜阻、高云龙出席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建议，与委员互动交流。

委员们建议，要优化大湾区“一走廊、一中心、三枢纽、多平台”创新合作空间布局，促进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向珠江东西两岸各市延伸。要有序推进三地行业标准、商标注册、执业资格互认，开设科研设备、样品过境绿色通道，创新金融合作监管方式，打通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的堵点。要放宽教育、医疗等准入限制，鼓励企业创新商业模式、合作方式，落实湾区内港澳科创企业同等国民待遇。要探索知识产权“一地申请、三地授权、权利互认”机制，建立国际技术产权交易中心，加强知识产权跨境执法合作。要加快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建设，推动事业单位招聘港澳大学毕业生试点。

国务委员王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重大战略，创新合作是大湾区建设的关键内容。粤港澳三地和各有关方面紧密协同大力推进创新合作，在推动重大科研载体建设、加强产业技术创新、促进要素高效便捷流动、加快创新合作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做好下一步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强化产业创新升级，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探索区域协同创新模式，加快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稳步推进一批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项目，不断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力、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Top](#)

【韩正：坚持“三稳”目标 落实长效机制 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7月24日主持召开房地产工作座谈会，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总结房地产长效机制试点方案实施情况，分析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部署下一阶段房地产重点工作。

韩正表示，房地产长效机制实施以来，取得明显成效，值得充分肯定。要坚持从全局出发，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因城施策、一城一策，从各地实际出发，采取差异化调控措施，及时科学精准调控，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韩正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高度重视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时刻绷紧房地产调控这根弦，坚定不移推进落实好长效机制。要全面落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发现问题要快速反应和处置，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要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稳住存量、严控增量，防止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要加强市场监测，对市场异动及时提示、指导和预警，精准分析市场形势。要抓紧建立住宅用地市场监测指标体系，定期公开各地土地储备和已出让土地建



设进展情况，接受社会监督。要发挥财税政策作用，有效调节住房需求。要持续整治房地产市场乱象，依法有效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要做好住房保障工作，因地制宜推进城镇老旧小区和棚户区改造，着力解决城市新市民和年轻人住房问题。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沈阳、成都、宁波、长沙等 10 个城市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10 个城市人民政府和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自然资源部负责同志作了发言。

[Top](#)

【胡春华：确保农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推进现场会 7 月 24 日在江苏徐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补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确保农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胡春华指出，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之年，“三农”领域短板必须如期补上。各地要对照各自全面小康定性定量指标，有针对性地强化政策举措、加大工作力度，按时保质完成补短板任务。要坚决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目标任务，因地制宜加大农村厕所革命和生活污水治理推进力度，做到一体化建设维护、一体化治理，把质量放在突出重要位置，确保建一个成一个。要深入开展农村爱国卫生运动，加快农村垃圾治理和健康乡村建设，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和卫生健康水平。

胡春华强调，明年“三农”工作重心将全面转向乡村振兴，要对标国家现代化目标认真谋划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举措，抓紧研究制定分类推进乡村振兴实施方案。要全面加强耕地保护，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行为，防止耕地过度“非食物化”。要坚持不懈抓好粮食和生猪生产，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Top](#)

【胡春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7 月 25 日在江苏连云港督导稳外贸稳外资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胡春华先后来到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云港片区、连云港综合保税区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地考察港口集装箱码头、新亚欧大陆桥东端起点、中哈物流合作基地，与冷链物流、医药、汽车电子等行业的内外资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

胡春华强调，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严峻复杂的情况下，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务实合作，促进相互贸易和投资，对于促进各国经济稳定发展、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具有重要意义。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充分利用线上线下等多种形式，加强供需信息交流，共同寻找商机。要支持中欧班列发展，发挥陆海联运优势，畅通国际物流通道。要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施好外商投资法及其配套条



例，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要全面加强对外贸外资企业的服务，确保各项纾困措施直达企业，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

[Top](#)

问题探射

哪些问题受到高层关注？哪些问题将被高层关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问题的发展和解决方式将怎样影响相关问题和同类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影响我们的宏观环境？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又该如何采取针对性措施？本栏目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得我们对于高层动向的追踪变得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功能性，其方法对我们的决策分析具有启迪意义，也将极大提升我们的决策分析的利用价值。

【中国低收入人口知多少？】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高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收入总量和人均收入额的不断攀升，到了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位于世界的第二位，2019年底人均GDP水平超过1万美元（按当时汇率）。相对于改革初期，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确实变得更加强大。这种经济改革的成就无疑在影响着人们对中国经济的判断，甚至造成了少数人的一种“梦幻”，导致了他们对中国经济在国际地位中的误判。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判断不仅现在来看是准确的，即使再过10年，这一判断仍不过时。从人均GDP水平来看，2019年中国是70892元人民币，按照当时汇率折算为10276美元，可以说中国正式成为“1万美元俱乐部成员国”。

但是，这离高收入国家标准还有一段差距，还需要经过多年的努力。根据最新资料，在全球有数据的178个国家或经济体中，中国排名66位，而且中国人均GDP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只相当于世界人均GDP的90%左右。更需要注意的是，从90年代开始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曾出现过较长时期的下降过程，至今仍没有恢复到原有的水平。与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收入占比是偏低，也就说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占比是偏高的。这意味着中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上的排位还要靠后。

再进一步说，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只是居民收入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虽然名为居民收入，实际上被政府用来提供公共服务。那么，按照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行比较，中国在世界上的排名还会后退几位。然而，这种国际比较只是就平均水平而言的。众所周知，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出现了长期持续的扩大过程，虽然中国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大幅度减少，但是相对贫困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善，而且有不恶化的趋势。这些问题都是快速发展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



今年“两会”后，有关居民收入和收入分配的问题引起社会关注和广泛的讨论。我们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居民收入和收入分配方面的研究，虽然也参与了这场讨论，也写了文章对有些问题，特别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进行了澄清，但是似乎人们的疑惑仍未散去。一些疑惑更多的是跟认识中国的低收入人群的规模、收入水平和收入分布有关。在此，我们试图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说明。

● 低收入人群的标准

人们对贫困人口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并不陌生。经过 40 多年坚持不懈的脱贫努力，至 2019 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已降至 551 万，这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数据推算出来的数字。推算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还需要贫困标准（贫困线）为依据，2019 年的全国农村贫困线是 3747 元，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这个标准则属于贫困户，全部家庭成员为贫困人口。

如果按照收入分层的标准方案，社会人群分为三大收入群体，即低收入人群（包括贫困人群）、中等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估算低收入人群的数量和比例需要知道低收入人群与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分界线，而如何确定这条线是有争议的，它涉及到如何估算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问题。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这条线可以是绝对标准如国家统计局使用的家庭年收入 8 万元（2010 年价格），换算 2019 年名义家庭人均收入 32256 元，月收入为 2688 元；也可以是相对标准如一些欧洲国家采用的收入中值的 2/3。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9 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为 26523 元，月收入为 2210 元，其 67% 为月收入 1480 元。这样，我们得到了一高一低两条低收入群体收入的上线。那么按照这两条线匡算下来的低收入人群的人数有多少呢？

● 有多少低收入人群？

我们利用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课题组 2018 年住户调查数据，在假定两年期间居民收入分布不变的情况下，来推算出 2019 年中国的低收入人群的数量和比例。按照上述的绝对标准（家庭年收入 10 万元），城乡低收入人群占全国人口的近 65%，相当于 9 亿人。如果按照相对标准（收入中位数的 2/3），那么低收入人群占比约为 37%，大约有 5.1 亿人。

为了回应近期网上有关低收入人群的争论，我们也利用该住户调查数据计算了月收入 500 元以下、1000 元以下、2000 元以下人群的分布比例和规模，相应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7.5%、23.5%、50.7%，由此推算总体人数分别是 1.1 亿、3.1 亿和 7.1 亿。这表明了在此之前有关“月收入 2000 元以下有 9.64 亿”的估计结果是不准确的，也许是 5 年以前的大体状况。当然，按照我们的估计结果，月收入 2000 元以下的 7.1 亿人，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人群，更何况我们还有大约 3.1 亿人的月收入在 1000 元以下，近 1 亿人月收入不足 500 元。虽然按照官方现行贫困标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已不足 1000 万，但是有很大一部分人群的收入也只是略高于贫困线，具有很大的返贫风险。

上述结果表明，中国仍是一个低收入人群占主体的社会，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具有的基本特征。一些媒体和机构过高估计居民的收入水平，或者以平均收入掩盖低收入人群仍占相当大比重的现实，并由此过度宣扬“民富国强”的经济发展程度，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会对社会舆论和政策选择带来很大的误导。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在减少低收入人群数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方面取得的进步。在过去 20 年中低收入群体不断减少，而且趋势表现非常明显。这是因为随着收入的提高，一部分低收入人群转变成中等收入人群，使得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不断上升。由此可见，在 18 年以前，按照绝对标准（家庭年收入 10 万元），接近 99% 的中国人都是低收入人群，在月收入 1000 元和 2000 元以下的人口为 10.8 亿和 12.5 亿，占当时总人口的 84% 和 97%。这意味从 2002 年以来，中国低收入人群减少了近 4 亿，他们基本上都升级为中等收入人群；月收入 1000 元以下人口减少了 7.7 亿，比例下降了 62 个百分点，月收入 500 元以下人口减少了 6.7 亿，比例下降了 53 个百分点。因而，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在过去改革开放 40 多年中，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居民收入快速提高的背景下，全社会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的比例大幅度减少，与此对应的是中高收入人群的比重不断提高，正在走向一个橄榄型的分层社会。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中国是从一个极端贫困国家一路走来，虽然行走的脚步比较快，但是碍于过去底子薄，基础差，加上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仍然没有摆脱一个发展中大国具有的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特征，仍然没有改变很大部分人口为低收入人群的格局。中国确实有不少富人，而且富人群体在扩大，他们的财富在快速积累，但是相对于中国 14 亿人口来说，富人的占比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高。我们不能看到一些媒体渲染个别富人的财富及其奢靡消费，就产生一种“中国人富起来”已是普遍现象的幻觉。这是非常危险的。

● 面对现实，解决问题

大部分人口属于低收入群体，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我们必须理性面对，同时要寻求解决的办法。从明年开始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的扶贫阶段，在消除绝对贫困以后，缓解相对贫困将成为中国未来反贫困战略的主旋律。

在一定贫困标准下，相对贫困人口与低收入群体有很大的重合度，从而缓解相对贫困与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具有同等社会价值和政策取向。为此，中国需要有一个总体的设计，形成一个以政策制定、政策落实和政策评估为主要内容的行动方案，以促进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不断上升，尽快形成一个公共资源和收入分配公平、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收入分配格局。

[Top](#)

【房地产和基建升温 消费成短板怎么办？】

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由负转正，主要得益于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出口增长超预期，其中房地产投资 4、5、6 月投资额同比增长分别为 6.97%、8.09%、8.54%，基建投资三个月同比增长分别为 2.7%、8.3%、6.8%；出口也是连续三个月正增长。相比之下，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恢复缓慢，服务业和消费恢复不及预期，上半年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11.4%，6 月份同比仍然为负增长，而同期美国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额已经是正增长 2.35%。

从二季度房地产交易和施工、竣工速度，地方专项债等支持基建投资增长和驱动因素分析，预计下半年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有望继续保持高增长，不排除单月同比两位数速度增长的可能；受海外疫情造成的其他国家商品供给缺口影响，中国出口增速下半年也将保持较高增长。相比之下，消费增速、服务业、



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成为下半年经济增长的短板。

以上失衡的经济增长结构虽然有助于下半年经济增速的恢复，却严重缺乏可持续性。在中国经济多年来已经逐渐转型升级到以内需、消费和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之后，为什么一次疫情的冲击就重新回到靠房地产、基建和出口拉动的旧模式？这既需要从逆周期调控的决策体制、决策惯性进行反思，也需要从部门到地方、从行政力量到市场影响的特定传导模式进行分析。

● 房地产和基建投资迅速升温，民间投资和消费成短板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3.1%，但5、6月投资增速同比分别为3.1%、5.91%，已连续两个月正增长。其中，房地产投资复苏力度较强，4、5、6月投资同比增长分别为6.97%、8.09%、8.54%，带动房地产开发累计投资由年初下滑16.3%快速转正至1.9%。受益于2季度房企开工快速回补、赋予省级人民政府更大用地自主权、信贷政策宽松等方面的影响，不仅6月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高达8.95%，而且房企拿地意愿较强，4、5、6月土地购置面积同比增长分别为13.8%、0.86%、12.11%。预计下半年房地产投资会持续升温，部分月份或重现两位数的增长。

上半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2.7%，4、5、6月投资额同比增长分别为2.7%、8.3%、6.8%，连续三个月投资增速正增长。随着7月第三批1.26万亿地方专项债下达，以及政府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等政策的加快推进，预计下半年基建投资增速还会进一步提高。

从出口增长情况看，主要得益于我国在全球率先控制住疫情、全面复工复产，填补了疫情冲击下的海外供给缺口，虽然上半年出口同比增长-3.0%，但4、5、6月同比增长分别为8.2%、1.4%、4.3%，已连续三个月正增长，预计下半年海外供给缺口依然存在，中国出口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与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升温、出口快速恢复形成对比的是，上半年制造业投资同比-11.7%，民企投资同比-7.3%，反映了民营企业、制造业对未来经济情景的预期不乐观。消费恢复不及预期，不仅上半年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11.4%，而且6月份同比-1.8%，不仅也没有恢复到正增长，而且比5月份仅收窄1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影响因素后，6月实际增速-2.9%。二季度除粮油食品、日用品、饮料烟酒、中西药品等必选消费品恢复较快，金银珠宝、石油制品、汽车、家具等大部分可选消费品都是严重负增长，餐饮、酒店、影视娱乐等服务业消费恢复更慢。

因此，从经济增长的健康可持续性出发，必须充分重视疫后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失衡的情况，并尽快采取措施改变消费需求恢复滞后于供给、服务业恢复滞后于制造业等短期不平衡情况。

● 重新审视稳消费的宏观决策机制

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近60%，投资贡献只有31%。因此决策层一再强调不能走过度依赖投资的老路，在两会后总理特别强调“我们推出的规模性政策叫做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注重的是稳就业、保民生，主要不是依赖上基建项目。因为现在中国经济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消费在经济增长中起主要拉动作用……”，但是实际上今年总额3.75万亿的地方专项债



大部分还是用来投资，加上银行配套资金，总额或达到近 10 万亿左右。2020 年上半年，虽然没有公布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比，但是可以想象，对二季度正增长做出主要贡献的是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出口也重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而消费、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贡献大幅降低。

为什么我们从决策科学上重视消费，却在实际行动中偏重刺激投资呢？这首先要从宏观决策机制角度进行深刻反思。

首先从财政政策的决策机制看，无论是从决策理念还是从决策机构设置看，稳投资都会惯性成为首选。比如：面对疫情冲击很多学者认为如果把资金发给消费者并不能带来持续的正向影响，要么沉淀、“打水漂”，要么一次性消费完了是“无水之源、无木之根”，而且其影响和效应不好考核，只有形成投资项目才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即形成短期需求，又形成长期供给。正因为如此，我国的大部分逆向调节的决策机制和机构设置透视围绕投资展开的，比如从中央部门财政部投资司、发改委规划司，到地方的经济部门设置，都是围绕选项目、报项目、审批项目等等，以投资项目为核心展开的。

在这样的决策理念和决策体制下，以投资项目为核心的稳增长计划，既容易通过，也有实施的机制保证。正因为如此，今年总额 3.75 万亿的地方专项债大部分用来搞投资，决策毫无障碍。假定给那 6 亿月收入只有 1000 元的中低收入者发放这 3.75 万亿，每人可发 6200 元——三口之家可增加 18000 元收入，5 口之家可增加 3 万多元收入，这将带来多大力度的消费复苏？不过，这在中国显然是在决策层面无法获得通过，在实施上财政部、发改委也没有类似消费司、居民收入司这样的机构设置。

与中国的投资主导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疫情对居民收入和消费的严重冲击，欧美国家稳增长、稳消费、稳就业的主要手段就是给消费者发钱。例如，美国政府宣布将实行 1.2 万亿美元的经济补贴计划，把钱直接发给国民；加拿大政府为全国所有因为疫情而不能工作的人支付 80% 的薪水，金额最高达每月每人 2500 英镑；韩国拨款 3271 亿韩元向居民提供财政补贴，每个家庭最高可达 50 万韩元等等。通过补贴民众生活，美国 6 月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额实现同比增长 2.35%，失业率也远远低于预期。

回顾历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长期重视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造成生活资料短缺、经济增长结构的严重失衡；如今我们又受体制惯性和决策惯性的影响，在走过特定阶段后继续依赖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来驱动经济增长，进一步加重增长结构的失衡，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事实上，只有靠最终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增长；不形成最终消费的投资项目，才是的“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资金进入居民手中、形成最终消费绝对不是“打水漂”而是“乘数效应”的开始。在那个大家都熟悉的“萧条的小镇”案例中，一个旅人拿 100 块钱去住旅馆住宿，店主把赚来的 100 块钱给了屠夫买猪肉，屠夫把赚来的 100 块钱用来理发，理发师又把这 100 块钱买了衣服……萧条的小镇复活了，消费复苏才能带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从货币政策稳消费的决策机制看，为什么欧美都连续大幅降息到零利率、负利率来稳消费、稳投资，而唯独中国却在降息问题上独树一帜？主要是在利率影响机制等关键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长期受一些决策认识误区的影响。

首先，只有在类似日本那样的老龄化的富裕社会，居民的存款利息才重要，对于 6 亿月收入只有 1000 元左右的中低收入人群而言，因为没有多少存款，所以也没多少存款收入，下调存款利率不会影响中低收入家庭。在疫情冲击下的



消费低迷时期，借口“考虑存款者的感受”、“保护居民存款收入”而变相鼓励储蓄，就是间接打击消费，是不合时宜的。

其次，利率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疫情冲击下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部分行业平距离利润率为负值，此时贷款利率若不能及时大幅下调，对于一亿两千万市场主体是不公平，也是不堪承受的。

第三，是否利率过低会产生套利、资源错配和资金流向不该流向的领域，还是要深刻认识长期以来中国货币流向扭曲的根本原因：我国的信贷资金流向实际上一直是受到体制性原因影响，遵循“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规律、硬资产抵押偏好的规律和隐形担保规律，不可避免地优先流向大企业、房地产企业、国有企业。所谓套利，除了利用上述体制缺陷套利，市场套利从来都不是因为利率低、钱多，恰恰相反，所有的套利都是因为资金短缺、利率过高才引发的，越是投机性资金越敢于承担高利率，而真正不堪高利率重负的是疫情冲击下运营艰难的实体经济。

从降低企业成本角度分析，以截至到6月份人民币贷款余额165万亿元计算，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信贷利率，可减少企业成本1.65万亿——大幅降息对刺激消费、降低企业成本的效果远远大于任何财政政策；从稳消费角度分析，在消费低迷的同时，中国的居民储蓄连续几个月上升，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至2019年底，全国住户居民存款总额达到了82.14万亿人民币；2020年上半年住户存款总额高达90.47万亿，半年时间增加高达8.33万亿元！这还不包括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的5.28万亿元——若再不大调低存款利率，居民储蓄偏好还会增加，下半年消费将继续成为增长短板，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失衡还会进一步加重。

● 高度重视稳消费的传导机制

传导机制上看，促进消费复苏可以从增加居民收入、推动地方政府考核机制转变、降低居民储蓄增长、推动股市慢牛长牛、稳定老消费、刺激新消费等方面入手。

考虑到消费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正相关，应该把各地地方政府的政绩指标中那些多年来排在前面GDP指标、招商引资指标、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地方财政收入指标等与投资相关的传统指标向后排并调低权重，把居民收入增长指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调查失业率等就业指标等与消费相关的指标排在最优先的位置，并提高考核权重。近年来，中央一再强调要退出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指标、政绩指标，我们认为除了增加营商环境指标、新经济占比等新的高质量指标之外，通过调整之前指标的权重，使之更能体现新时期的消费拉动的结构特点，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考虑到中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不应该简单否定各地发放消费券的做法，而应该由中央财政统一给中低收入者发放消费券或消费补贴，

股市的慢牛、长牛，也能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因而对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值得警惕的是快速上涨的疯牛不但无助与消费增长，而且一旦崩盘会产生“负财富效应”打击消费，因此维护股市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于持续扩大消费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图 1：中国的消费传导路径



从不同类型的消费传导机制来看，要区分老消费和新消费的不同消费弹性。由于老消费的需求弹性较低，不能期待有期望原有增速之外的增量消费增长，只能逐步恢复到原有水平，因此恢复老消费不需要大比例的产品消费补贴，在增加居民收入、降息等宏观政策之外，之后要加大复商、复市力度，促进人们正常往来，就可逐步恢复；而以 5G 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消费，不仅符合未来经济结构升级的方向，而且“乘数效应”大，应安排较大比例的消费补贴予以支持——假定对 5G 手机和新能源汽车给予不低于 20% 的消费补贴，可带动 3 万亿以上的新消费增长。

[Top](#)

【政策中期效果同样重要 警惕疫情影响金融稳定】

目前来看，疫情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冲击，并没有在第一阶段对金融领域造成太大的影响，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我们依然需要提高警惕，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实体经济危机很可能冲击金融系统，造成金融不稳定，而金融不稳定也将反过来进一步恶化实体经济，形成恶性循环。因此，需要在研究和制定政策时对金融稳定问题未雨绸缪。

第一，目前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依然是疫情发展，疫情每天都在动态变化之中。

两个多月前，在 G30 (Group of Thirty) 关于疫情及其对策的视频研讨会上，笔者提出，疫情将使得某些经济活动，特别是需要人员接触的服务行业，陷入暂停状态。如果疫情能够被克服，就可以放开暂停键，后来有人把疫情冲击总结为“大暂停”。

在那场会议上，G30 中的一些西方代表认为，不用担心发达国家的疫情扩散，发展中国家更值得担心，特别是非洲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科技落后，一旦出现问题将会非常危险。

但笔者当时认为，未来疫情蔓延的实际情况不一定如此。后来我们看到，在 5 月份至 6 月初，西方国家的疫情反而更加严重。但西方国家的预言也命中了一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印度、俄罗斯的疫情发展确实非常猛烈。

“大暂停”的另一层含义是，虽然宏观经济政策有可能缓解疫情冲击，但却无法代替抗疫本身。只有在疫情得到控制后，社会隔离才能真正解除，因此我们需要特别关注抗疫的效果。

从中期来讲，抗疫效果最终取决于疫苗；但从短期来讲，由于各个国家抗疫措施和政策倾向不同，抗疫效果也存在巨大差别。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特别是拉丁美洲、中东和南亚这三个地区，确诊病例上升猛烈。中国的数据最开始排名第



一，有 8 万多确诊病例，到后期逐渐下滑，现在中国的数据排在 25、26 名左右。中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确诊人数排名靠前，后期被新兴市场经济体反超。

大家往往关注疫情严重的国家，但很少关注确诊人数少的国家。韩国共有一万多名感染者，日本共有两万多名，和西方国家相比，日韩的疫情爆发程度相当缓和。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南部的邻国，如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等，这些国家疫情感染人数非常少。到目前为止，越南感染者 382 例，因疫情死亡 0 例；缅甸感染者 399 例，死亡 6 例；柬埔寨感染者 171 例，死亡 0 例；老挝感染者 19 例，死亡 0 例。和全球大部分国家相比，这样的疫情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但跨过缅甸南部边界到南亚地区，疫情则较为严重，如孟加拉国感染者达 20 万，印度达 100 万，巴基斯坦接近 30 万。

可见，亚洲的各个发展中国家受疫情影响的差别很大，这一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研究与思考。总体而言，在制定经济和金融政策时，首先需要观察抗疫的情况。

第二，在宏观经济政策响应方面，大家往往关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短期效果，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往往面临着中短期影响的两难选择。因此，政策的中期效果同样值得关注，需要对此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与论证。

第三，疫情将会对微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疫情之后，企业和家庭等微观主体的行为模式和需求模式将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对此要进行充分的预先研究，才能较好地加以应对。

第四，微观变化和结构性变化相互关联，疫情之后，我们将会看到与想象中不同的结构性变化。在研究和制定政策时，应当避免一味追求恢复之前的状态。结构性变化主要是以下两点：

首先是疫情之后，人们更加倾向于“数字化生存”。数字化生存是 90 年代《Being Digital》一书提出的概念。今后，在生活方式、交流方式等各个方面，数字化趋势将会更加突出。

其次是 ESG (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 理念将更加深入人心。ESG 在市场行为和决策方面的权重将会有显著的提高，需要充分重视这一变化。在宏观层面，总需求的提升不仅是恢复疫情前的需求，同时要在新的领域中，如 ESG 领域、绿色发展领域，谋求新的增长点和新的需求。

第五，关于对外开放。此前，在中美摩擦中，中国坚持了正确的选择，中央强调“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疫情发生后，一部分国家选择了保护主义的道路，对疫情以及超越疫情的许多问题采取了“甩锅”的态度，形成对比的则是中国选择继续扩大开放。但在未来进一步开放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认真考虑以下问题：

首先，选择“甩锅”、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始作俑者必然有错在先，但另外一方是否必然跟随着选择报复？从维护民族尊严，从外交和政策的层面考虑，一定的反击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报复也可能会影响到开放程度，可能会使得全球化和多边主义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因此需要做好分析和权衡。

此外，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挑起一系列事端，开启了“以国家安全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的先河。我国也高度关注国家经济安全和其它方面的安全，但如果“安全仗”持续进行，也将对开放程度产生影响。

在对外开放方面，我们需要做更细致的研究和权衡工作，要以更加开放、更加支持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态度，迎接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的挑战。

第六，金融稳定方面。历史上约 80% 的危机起源于实体经济方面的问题，并



最终反映为金融危机。

例如，美国房地产政策失误引发的问题，反映在了次级贷款上，而次贷危机则迅速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可见，实体经济问题容易导致金融问题的加速暴露。

目前来看，疫情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冲击，并没有在第一阶段对金融领域造成太大的影响，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我们依然需要提高警惕，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实体经济危机很可能冲击金融系统，造成金融不稳定，而金融不稳定也将反过来进一步恶化实体经济，形成恶性循环。因此，需要在研究和制定政策时对金融稳定问题未雨绸缪。

第七，疫情对金融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方面，“数字化生存”在金融领域的重大变革，可能主要体现在支付模式上。新形势之下，对于数字化支付系统的需求会更大，这方面可供应用的技术创新也更多。在支付系统方面，未来可能面临着很多机会，需要加深研究。

另一方面，金融基础设施的覆盖范围要更加广泛。需加紧巩固金融基础设施，减少问题、提高效率，为新的经济增长发展模式做好准备，提供新的支撑。

此外，由于数字化生存和未来人与人接触频度的变化，今后我国金融业的就业模式也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

[Top](#)

人物关注

毫无疑问，人是社会和经济环境中最活跃的因素。那么，哪些人的思想在影响中央高层的决策？哪些人会特别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这些人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倾向是什么？这些特征如何影响事态发展？他们怎样影响中央高层、怎样影响周边环境？“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物分析将有助于揭开复杂事物的真相，从而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省部级干部调整，龚正当选上海市市长】

● 龚正当选上海市市长

7月21日，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龚正当选上海市市长，刘学新当选上海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龚正，1960年3月生，是十九届中央委员，曾任海关总署副署长，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等职，今年3月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刘学新，1963年12月生，曾任福建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等职，今年5月



起任上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 **贵州省委常委、秘书长刘捷兼任省委组织部部长**

7月24日，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组织部部长刘捷主持省委组织部部务会会议。据了解，这是刘捷首次以贵州省委组织部部长身份公开亮相。

刘捷，1970年1月出生，曾任湖南省商务厅厅长，江西新余市市长，新余市委书记，江西省委副秘书长（正厅级）等职，2016年任江西省省委常委、秘书长，2018年5月起任贵州省委常委、秘书长。原任贵州省委组织部部长的李邑飞今年5月已调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 **西藏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边巴扎西出任国家民委副主任**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官方网站“领导之窗”栏目近日进行更新，据最新名单显示，边巴扎西已任国家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边巴扎西，1964年10月生，曾长期在中央统战部工作，2007年调任西藏那曲地委副书记，后历任那曲地委书记，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等职，2016年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 **张文兵、徐文海任湖北省副省长 曾欣不再担任**

7月24日上午，湖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任命张文兵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决定任命徐文海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决定接受曾欣辞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请求、免去其湖北省公安厅厅长职务。

张文兵，1971年11月出生，曾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司司长，2020年1月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司长，同年6月调任湖北省政府党组成员。徐文海，1965年9月生，长期在广东省工作，2016年任深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今年6月调任湖北省政府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党委书记、督察长，省委政法委员会第一副书记。

- **兴安盟盟长奇巴图升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 马学军不再担任**

2020年7月23日，内蒙古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免去马学军的自治区副主席职务，决定任命奇巴图为自治区副主席。

奇巴图，蒙古族，1971年9月出生，曾任呼和浩特市委常委，土默特左旗委书记，兴安盟盟委委员、副盟长；2016年10月任兴安盟盟委副书记、盟长。马学军，男，东乡族，1962年10月生，曾任新疆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18年7月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政府党组副书记。

- **赵龙任福建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

据福建省政府网站“省政府领导”栏目更新显示，赵龙，现任福建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



7月22日上午，福建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任命赵龙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赵龙，1967年9月生，曾长期在原国土资源部工作，历任国土资源部地籍管理司副司长、国家土地督察济南局局长、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等职。2016年升任国土资源部副部长，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任自然资源部副部长。

● **庄稼汉任福建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此前担任厦门市市长**

据福建省委统战部官网“部领导介绍”页面更新显示，庄稼汉已任福建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邢善萍不再担任统战部长职务。

庄稼汉，男，1963年10月生，此前担任厦门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邢善萍，女，1968年4月生，历任山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福建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兼政协党组副书记，2020年3月兼任省委宣传部部长。

● **刘宁辞任青海省省长 严金海辞任副省长 文国栋任青海省副省长**

7月22日，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接受刘宁辞去青海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接受严金海辞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请求。任命：文国栋为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刘宁，1962年1月生，2017年任青海省委副书记，2018年9月当选青海省省长，近日已任辽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严金海，1962年3月生，2013年任青海省副省长，2017年任青海省委常委、副省长，近日已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文国栋，1969年8月生，曾任玉树州委书记等职务，2015年任海西州委书记，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党工委书记，近日已任青海省政府党组成员。

● **李干杰当选山东省省长**

7月21日上午，山东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会议选举李干杰为山东省人民政府省长。

李干杰，1964年11月出生，曾任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河北省委副书记等职，2017年任环境保护部党组书记、部长，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任生态环境部部长、党组书记，今年4月任山东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代省长。

● **于杰辞任山东省副省长 已任省委常委**

7月19日上午，山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经过表决，决定接受于杰辞去山东省副省长职务请求。

于杰，1963年6月生，曾长期在贵州省工作，历任贵州省科技厅厅长，贵州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正厅级）、常务副部长等职务，2018年1月任山东省副省长，近日已任山东省委常委。

● **青海省委常委、副省长严金海出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7月20日上午，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区党委全面依法治藏委员会主任吴英杰主持召开区党委全面依法治藏委员会会议。严金海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身份出席会议。此信息显示，原任青海省委常委、副省长的严金海已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严金海，藏族，1962年3月生，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曾任玉树州委副书记，海北州州长，海北州委书记等职，2013年任青海省副省长，2017年任青海省委常委、副省长。

● 王嘉毅任甘肃省委宣传部长 石谋军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甘肃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2020年第十一次会议7月20日下午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嘉毅，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石谋军等出席会议。

上述报道显示，王嘉毅已任甘肃省委宣传部长，石谋军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王嘉毅，1965年12月生，曾任西北师范大学校长，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党组副书记，省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2017年任甘肃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石谋军，男，苗族，1968年2月生，曾长期在湖南省任职，历任湖南省常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办公厅主任等职务，2017年调任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原任甘肃省委宣传部长的是陈青，女，1960年6月出生，今年1月当选为甘肃省政协副主席。

[Top](#)

智囊高参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在中南海内外，活跃着一个特殊的幕僚群体，他们为中央高层出谋划策，并有意无意地向外界释放思想、建议、政策措施等相关信息。关注他们的观点、建议和动向，就好像“更上一层楼”，可“穷千里目”。

【刘元春：疫情长期化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再定位】

目前学术界对疫情的判断已经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形成了一些新共识。这些新变化和新共识决定了世界抗疫进程、经济复苏模式以及相应的政策都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疫情的新变化和新规律决定了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再定位。

根据 SCIENCE 和其他几个学术平台发表的近期文章，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



新共识：

第一，新冠病毒可以在一年内任何时候扩散，没有固定时间。

第二，感染者治愈后很可能无法获得长期的免疫力，之前某些国家或地区提出的群体免疫可能并不会取得好的效果。

第三，新冠病毒的突变率非常高，对环境的适应力很强，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疫苗效果，导致研制的疫苗在短期内有效，而在未来不一定有效。

第四，无症状病毒携带者和一些新发现的情况证明我们对病毒的传播路径和方式依然不是十分清楚。最近几位科学家指出病毒早已存在，只是现在被激活而已。

第五，疫苗与特效药的研制时间比想象中要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

第六，病毒很可能将与人类长期共存，疫情很可能持续存在并反复出现。

这些变化和共识直接导致许多研究团队在进行宏观分析中考虑的不仅是二次冲击和二次暴发的问题，而是多次反复暴发的问题。这种情况会导致目前的政策应对会出现一些变化。

疫情持续的时间拉长和影响的范围拉宽将会引发一系列重大问题：

第一，疫情并未像预期中那样在6至7月份到达顶点，疫情拐点的出现大大延迟。特别是进入7月以来，以欧美为主体的世界疫情第二板块蔓延还在持续上扬，以拉美、南亚和非洲为主体的第三板块蔓延已经抬头，同时北京、东京以及首尔已取得疫情阻击战阶段性胜利却都出现了疫情复发，世界确证病例超过1300万，日增超过17万，让未来疫情的可控性增加了非常大的变数。

第二，随着防疫周期不断延长，防控成本也在加速提升。

第三，发达国家前期布局的疫情防控方案和救助方案可能会失效。例如，欧美之前提出的群体性免疫理论框架可能会崩溃；欧美所设计的第一轮疫情救助方案难以承受疫情时间的持续，安排的经费可能很快会用光，政策工具可能消耗殆尽。

第四，疫情带来的混乱状态很可能造成超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全面爆发，社会隔离、生活方式的调整可能会带来社会情绪和秩序的超级变异。当前世界经济存在“日本化”倾向，即长期停滞的经济状态可能更加低迷，这可能会使我们原来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使一些社会冲突、政治危机全面爆发。例如当前美国爆发的BLM运动，巴西和印度以及一些非洲国家所发生的骚乱。从历史经验来看，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等国内问题可能会带来国际问题的全面恶化。疫情的长期化将成为一个超级催化剂，使我们原来就面临的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对于中国而言，疫情长期化带来的冲击可能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经济触底的时间推迟，并非以前预期的第二季度。在外需下滑冲击延后的情况下，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可能会在第三季度到达高点，并且第四季度依然存在。所以未来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

第二，世界疫情带来的第三波冲击与第一波和第二波带来的冲击将具有很大的区别。第一波、第二波冲击主要是对供应链的冲击，但是第三波冲击更多是针对需求侧。

第三，欧美第一轮救助政策耗尽，下半年可能会出现几个超级调整。今年上半年出现了五大史诗级变化，下半年经济相应的变化也会十分剧烈。第一，经济处于底部的时间比想象中要漫长，导致政府补贴耗尽、企业破产加剧；第二，金融持续加码，脱实向虚现象更为严重，世界金融市场出现第二次剧烈调整是大概



率事件；第三，美元指数可能出现大幅度的调整，美国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将出现混乱，人民币的铆钉效应强化，资本流入中国的现象加剧。

第四，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导致美国出现政治危机，这种政治危机很可能被美国大选激化，从而导致中美冲突达到新高度。这种政治风险外溢将会导致中国面临的经济风险加剧。全球金融资产定价不单是由自身收益率决定，社会风险、政治风险会导致金融定价规律发生超级变异。

第五，国内疫情的反复将给国内经济主体带来的冲击，会导致预期模式、工作和学习方式发生巨大变化。

第六，疫情反复导致经济局部出现二次停摆。

第七，疫情常态化与短期救助之间存在冲突。在第二季度特别是6月份以来，我国计划从短期救助向中期复苏的节奏全面迈进，然而疫情的二次暴发会使中期复苏的一揽子规模性政策的节奏被全面打乱。

针对以上状况，我们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采取应对政策：

第一，宏观目标调整应该从短期年度目标向中期目标转变，特别是以疫情周期为统筹对象进行目标设定和工具选择。

第二，由于疫情防控转向中长期化，政策空间要有新的规划。现在很多观点认为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很大，所以前期的力度可以更大。但是目前我国的财政实际赤字率在今年可能会达到11%，并受到汇率因素、中小银行风险、呆坏账延期的影响，货币政策的空间也十分有限。因此，政策不能够一次性全部投入，要为明年留有余地，甚至要为后年的一些变化做好充分的准备。

第三，扩大“六保”与底线管理的内涵。底线管理的内涵必须扩大，金融风险、政治社会风险的外溢效应对经济领域的影响比想象中要大，要将风险管控重新提上我们的重要议程。特别是全球经济变异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的变化，以及中美贸易冲突、大国博弈中的政治风险对经济领域的冲击需要研究得更加清楚。通过最近几个爆雷事件以及中小企业潜在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利用中小银行进行针对中小企业的救助，其带来的风险可能比问题本身要大，这一问题十分棘手。

第四，双循环战略可能还要进一步深化，特别是要提高对国际货币循环的重视，在国际货币体系重构以及金融战应对上要有更深入的思考，而不是简单的从实体经济、内贸与外贸一体化和互相促进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国际金融的循环、国际货币体系的循环都非常重要。

第五，要进一步推进新动能的构建，使之与后疫情社会政治运行体系调整有很好的衔接和匹配。要将“非接触经济”的打造上升到战略层面。要考虑一揽子政策里以新基建为主体的政策是否能够担任我国新经济模式加速转型的重任。

第六，要推进一次性短期行政救助体系与制度性、体制性救助体系的构建。任何一个制度性救助体系构建得很好的社会，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都十分良好。如果疫情中长期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度性的保障和救助上面要有所突破，特别是在收入分配体系的大改革上面要有所突破。

第七，把握好缓慢复苏与快速复苏的节奏。要思考如果疫情防控中长期化，快速复苏的节奏应该把握在什么水平。同时，我们提出的需求侧提升和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到底如何相互配合？都需要我们做一些深入思考。疫情常态化并不是一句空话，我们要在各种政策里面优先考虑疫情防控，所以疫情扩散基础性的预测就显得尤其重要。

（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

[Top](#)



【李国平：“十四五”期间需要制定差异化的区域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实施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战略，我国区域经济总体呈现出不均衡的增长格局，区域差距不断扩大。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家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旨在缩小区域差异的区域发展战略，使得我国区域间差距呈现缩小态势，区域经济逐步从不均衡发展进入到相对均衡、协调发展的阶段。

然而，近年来，我国经济空间结构演化面临新的影响因素和外部环境，驱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已经从自然禀赋等第一性地理因素转变为以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以及知识要素为主导所形成的新空间集聚等第二性地理因素。我国经济空间结构面临一系列突出问题，区域经济增长分化现象突出，“三北”经济增长乏力，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已经呈现出从“东快西慢”的东西差距转化为“南快北慢”的南北差距，东西问题突出转化为南北问题突出，部分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地位下降过快，空间发展格局又开始出现明显的不平衡。

导致经济空间结构这一变化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长期结果。既有自然地理（包括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和区位因素等）这样的第一性因素，也有包括规模经济、外部经济、分工与专业化等在内的空间集聚这些第二性因素。不仅有土地、资本、劳动力这些传统的经济增长因素，还有知识、人才等新经济增长因素。自然与区位条件，产业结构特征，人口、劳动力和消费市场，交通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区域政策等因素变化，共同作用并影响了我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

“十四五”期间，我国将进入“以高质量发展为特征的全面协调发展阶段”。解决我国区域发展中存在的区域分化以及区域差异扩大问题，重塑经济空间格局，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区域发展中的重大课题。基于影响我国经济空间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我们研究认为“十四五”期间，必须多策并举，需要重新进行区域划分并制定差异化的区域政策，从而实现调整和优化中国经济空间结构，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重新划分中国区域由现在的四大区域划分为五大区域，并制定差异化的区域政策。

我国大的区域划分，南北应以秦岭淮河为界，东西应以胡焕庸线为界进行区域板块划分，另外可以将东北单独划出，并将西部地区根据资源禀赋和及其定位分为西北（含青藏）和西南两个地区。具体方案为华中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山东 6 省市；华东南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10 省市；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3 省；西北地区，包括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西藏、青海、新疆 7 省区；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 5 省市区。

重新划分中国区域，主要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一是更加符合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体现区域内的一致性和区域间的最大差别性，和中国三大自然区、胡焕庸线、秦岭—淮河南北地理分界线、关内关外等地理标志界线吻合；

2. 二是反映了历史发展基础、经济发展现状、社会文化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一致性；

3. 三是区域内部的联系比以往四大区域更加紧密，中国的四大区域更多的是地理区域，而非经济区域，比方说原中部区域内部省份的联系不是很紧密，甚至



可以说区外联系大于区内联系，原东部地区过于狭长，南北联系也不是很紧密；

4. 四是新的五大区域从形态上看，更接近于圆形，这样便于交通组织、经济联系以及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新五大区域中面积最大和人口密度最低的为西北地区，面积占全国的 57.3%，人口密度为 23.91 人/平方公里；人口最多的华东南地区，人口为 5.62 亿，占全国的 40.26%；经济总量最大和人均 GDP 水平最高的也是华东南地区，2018 年 GDP44.72 万亿，占全国的近一半（48.89%），人均 GDP 为 7.95 万元（下表）。

区域	面积		人口			GDP		人均GDP	
	万平方公里	比重 (%)	总量 (亿人)	比重 (%)	密度 (人/平方公里)	总量 (万亿元)	比重 (%)	万元	
北方地区	东北	80.63	8.4	1.08	7.76	133.95	5.68	6.2	5.24
	西北	551.97	57.3	1.32	9.42	23.91	7.02	7.68	5.34
	华北	69.29	7.2	3.46	24.8	499.35	22.65	24.76	6.54
	小计	701.89	72.9	5.86	41.98	83.49	35.35	38.64	6.03
南方地区	华东南	135.9	14.1	5.62	40.26	413.54	44.72	48.89	7.95
	西南	125.06	13.0	2.48	17.76	198.30	11.41	12.47	4.60
	小计	260.96	27.1	8.10	58.02	310.39	56.13	61.35	6.93
全国	合计	962.85	100	13.96	100	144.99	91.48	100	6.55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整理分析

在新的划分基础上，才有可能更有针对性地根据各个区域的特点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政策。例如西南和西北地区在资源禀赋、发展条件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西南地区随着长江经济带建设，发展速度加快，具有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新优势；而西北地区则在发展原材料、能源、矿产等基础和原材料产业方面有优势。所以将原西部地区重新划分为西南和西北地区两个区域，就可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政策。

（李国平：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

[Top](#)



虎视寰球

全球化加剧外部冲击的力度，既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又使全球经济的发展更加不平衡，并导致各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和社会等等全方位的矛盾和冲突。如何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化弊为利？从决策的角度，不仅中央高层在殚精竭虑，那些有志于在全球化中冲破重围的企业家和改革家更是殚精竭力。那么，双方如何互动？本栏目力求更多的向大家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启发。

【英国“殖民迷思”何时休】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方将立即、无期限地暂停与香港引渡协定，并禁止向香港出口有关武器。香港早已不是英国的殖民地，但一些英国政客至今不肯放弃“殖民情结”，公然插手香港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分析人士指出，殖民主义早应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而英国不仅昔日在被迫结束殖民统治时埋下种种祸根贻害世界，至今仍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捞取利益。英国应当彻底反思殖民历史，摒弃“殖民迷思”。

克什米尔问题、巴以问题……在这些至今仍长期持续的冲突背后，都能发现同一个始作俑者——英国。这个昔日最大的殖民帝国不仅通过“分而治之”的惯用手段分化海外殖民地人民，还在结束殖民、撤出殖民地的过程中埋下祸根，设置地缘、部族、法律等障碍，助长这些地区的土地、民族、宗教矛盾，导致长期对抗和冲突。英国前首相卡梅伦也曾承认，世界各地的许多历史性问题都与大英帝国留下的遗产有关。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长期争端。英国当年撤离南亚时搞印巴分治，遗留下克什米尔归属问题，导致印巴两国为此至今冲突不断，深深影响了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全球正在“收获”英帝国种下的纷扰。在香港和克什米尔，当地人仍然在为英国殖民者离开时留下的一团乱麻埋单。

分析人士指出，英国等殖民国家过去将殖民地变为原料基地，导致其经济结构单一、畸形。如今，英国等国对前殖民地由过去的直接统治逐渐转为间接操控，进行“隐性殖民”，即以经济手段为主，交叉使用政治、文化和军事手段对其进行控制、干涉和掠夺，其中以在非洲大陆的做法最为典型。

以非洲最大产油国尼日利亚为例，早在 2002 年，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就拥有了该国石油储量的 55%，日均产量占全国的 40%。而尼日利亚却因为缺乏自己的石油生产加工体系，至今仍面临“出口石油、进口汽油”的尴尬。

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美国家还常以附带苛刻条件的“赠予”“援助”和“贷款”干涉非洲国家内政，通过西方主导的金融机构强迫非洲国家照搬西方发展模式，使得这些国家赤裸裸地暴露在西方商品冲击之下，经济长期低迷，沦为西方附庸。



此外，英国还利用英联邦谋求对前殖民地的控制。2016年，马尔代夫宣布退出英联邦，正是因为不满英国通过英联邦介入马内部事务。分析人士指出，英联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英帝国架构的延续，英国不仅以此影响、干预前殖民地内部事务，甚至以此为抓手插手其所在地区事务。

作为曾经的殖民大国，英国对“日不落帝国”殖民主义的“怀旧”心态极为深厚。英国“伦敦经济”新闻网站日前刊文说，今年一项调查发现，30%的英国人对殖民主义感到自豪，英国人比其他欧洲人更怀念殖民主义。文章指出：“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对以帝国之名犯下的罪行缺乏了解——这种情况被为帝国辩护的人无情利用，以推行他们自己的残酷政治。”

今年5月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在全球引发反种族主义、反殖民主义运动并持续至今。英国也掀起了反殖民主义浪潮，多个城市的民众举行多场游行抗议，发起清算殖民历史并推倒殖民者雕像的运动。在此背景下，英国警方、伦敦市政厅、博物院、大学、银行、民间机构等社会各方纷纷表态，或是为自身的贩奴发家史道歉，或是支持理性拆除殖民者雕像。

然而，英国首相约翰逊却对此声称：“推倒雕像是抹去英国历史的举动。”一些保守情结严重的政客也纷纷附和。批评者认为，英国政要的言行说明了“这个国家看待过去的方式”。

分析人士指出，英国政客们应该扪心自省，真正反思曾经的殖民历史，摒弃殖民心态，抛弃继续影响和控制前殖民地的“迷思”。

[Top](#)

【美国关税“大棒”没砸动欧洲】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称，如果法国不放弃新征收数字服务税的计划，美国将对从法国进口价值13亿美元的商品加征额外25%的关税，涉及商品包括化妆品、肥皂和手提包。另据《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通过加征关税报复法国对美企业征收数字税的做法，将加剧美法贸易纠纷，并进一步破坏已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经济。

● 美国：谁收数字税报复谁

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消息并非出人意料，早在2019年12月美国政府就曾表示将考虑提高对法国商品的关税，以反制法国对美国科技企业征收数字税的做法。2019年，法国通过数字税计划，征税对象主要涉及美国的科技巨头如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美国政府以“法国不公平对待美国企业”为由，于2019年7月对法国数字服务税发起301调查。美国国会议员和科技公司支持美国政府让法国和其他国家撤回数字税的提案。2019年12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301调查结果称，法国的数字税“歧视美国公司，与国际税收政策的现行原则相抵触，并且对受影响的美国公司造成异常沉重的负担”，并建议美国对输美的法国商品征收高达100%的关税作为报复。

经过一番磋商，今年1月，美法两国同意休战并展开谈判。与此同时，多个国家的谈判者试图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框架就如何对跨境互联网企业征收数字税达成多边协议。然而，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谈判进程变得复杂。考虑到迟迟没有进展，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6月出人意料地宣布暂停谈判，警告将对



任何向美国科技企业征收数字税的国家进行报复。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导致各国财政负担加重和税收减少，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考虑使用数字税增加税收，这将给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带来新的负担。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和英国都宣布了征收数字服务税的计划。特朗普政府 6 月份对 10 个国家启动贸易调查，以反制这些国家的数字税提议，涉及的国家包括英国、印度和土耳其等。

● 欧洲：美国互联网巨头逃税不公

此间分析人士指出，尽管特朗普政府口口声声抱怨美国的传统制造业衰落、制造业的工作机会“被偷走”，但实际上美国传统制造业的衰落是因为美国早已进行了产业转移，将资本更多投入到互联网公司。欧洲国家则认为，当前的税收制度主要针对传统企业制定，对新兴的互联网企业则存在诸多灰色地带，导致互联网企业缴税不足。据美国福布斯网站报道，法国财政部部长勒梅尔就曾指责，美科技巨头如苹果、谷歌和脸书通过将欧洲总部设在爱尔兰和卢森堡等“避税天堂”国家来“逃避”税收。这些美国公司在法国、德国等地开展业务赚得盆满钵满，却享受着爱尔兰和卢森堡的低税收待遇，这显然有失公平。因此，各国都在努力制定数字税，规范对互联网企业的商业征税。

法国和其他国家认为，大型跨国科技公司通过在本地运营获得了大量的收益，然而这些公司对本地的贡献却很小，因此数字税是这些国家从大型科技公司增加税收收入的一个方式。此外，法国国内的民间力量表示，谷歌和亚马逊这样的科技巨头正在“杀死”小型企业，并且涉及严重的侵犯隐私问题。众所周知，全世界互联网巨头多来自美国，这些数字税首当其冲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不可能善罢甘休。

但美法作为跨大西洋盟友，还是彼此给对方留出了余地。法国尽管通过了数字税计划，但同意推迟征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认为，因为法国还没有开始征收数字税，因此美拟对部分法输美化妆品和手提包加征的关税将被推迟 180 天，即 2021 年 1 月 6 日才会生效，这给双方通过谈判和解留出了时间。此外，在此次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征税清单中，法国奶酪、起泡酒和炊具“特别”地“消失”了，而这些都是美国政府在 2019 年 12 月威胁加征关税的商品。显然，此次美国的加征关税措施留有余地。

● 法国：有中国市场托底

据媒体报道，美国的葡萄酒零售商和其他法国商品的美国进口商已经对这些潜在的关税表示反对，称这将损害美国公司和工人。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负责供应链和海关政策的副会长乔纳森·戈尔德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尽管我们反对法国的数字税，我们对特朗普政府继续使用关税感到失望。美国应该就多边解决方案进行谈判，而不是对美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关税，尤其是在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正努力从疫情中恢复经济的过程中。关税是由美国公司缴纳的税款，并且已经转嫁给消费者。”

一位欧盟发言人表示，如果经合组织的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布鲁塞尔可以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该发言人敦促华盛顿重启谈判。另据消息人士指出，尽管美国宣布暂停经合组织的谈判，但美欧围绕数字税的讨论仍在进行。此外，数字税



问题还会在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视频会议上被讨论。欧盟驻华盛顿代表团的发言人认为，欧盟将数字经济的公平征税作为重中之重，所有企业应缴纳应有的税额。法国财长勒梅尔近日在布鲁塞尔表示，“法国的反应不会改变，如果到今年年底没有国际性的解决方案，我们将实施数字税”。

如果美法谈判失败，美对法加征关税的结果可能会对奢侈品领域带来冲击，涉及路易威登、欧莱雅、开云集团和爱马仕。福布斯网站称，当法国手提包成为美法政策辩论的象征物，美国消费者如果想要购买法国设计的手提包，就要付出更高的价格。

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高级时装公司对美国最新关税威胁的反应并不大，因为相较于中国市场而言，美国奢侈品市场前景暗淡。报道称，在美国发出关税威胁后，在巴黎上市的奢侈品公司路易威登、开云和爱马仕的股价反而走高。有观点认为，当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期过去后，美国对于奢侈品牌的重要性可能会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经济将比美欧更快复苏，从而让奢侈品企业更加依赖中国顾客。据贝恩咨询公司的预计，到 2025 年全球奢侈品销售额中至少 49% 来自中国顾客。《华尔街日报》认为，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的威胁已经不像 8 个月前那样严重。有一种现象越来越明确，只有中国市场出现新变化，奢侈品行业才会做出反应。

[Top](#)

华夏透视

善于学习的人懂得把观察、经验和知识转化为智能并使用得当，不仅能将梦想持之以恒，更懂得如何事半功倍。投资大师巴菲特在给其老师本·格雷厄姆的著作《聪明的投资者》所写的序言中说：“长年进行成功的投资并不需要极高的智商、罕见的商业洞见，或内部消息。真正必要的是做决策所需的合理的知识框架，以及避免情绪化侵蚀智识的能力。”本栏目力图提供一个中央高层动向及其影响分析与政经趋势分析相结合的框架，从而达到把握最关键、最重要的决策信息和决策要点的效果。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和分析也将因此得到升华。

【上调中国 2020 年 GDP 增速预测】

● 二季度强劲的反弹趋势能否延续？

受益于内需大幅改善、出口强于预期，二季度 GDP 增速反弹幅度超预期。考虑到大部分国内经济活动已基本恢复常态，三四季度 GDP 环比增长势头应会减弱，不过整体经济仍有望进一步回暖（假设国内疫情不会再次大规模爆发）。我们预计下半年消费增速将转正，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继续保持稳健，因此即便下半



年 GDP 环比增速大幅放缓，实际 GDP 同比增速也应能反弹至 5.5-6%。

● 下半年政策应会继续保持宽松，但存款基准利率应不会下调

虽然二季度整体经济大幅反弹，但鉴于经济活动仍未完全恢复常态、劳动力市场依然承压，我们认为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仍会维持目前宏观政策的宽松基调，以支持下半年经济的复苏。不过，二季度经济的强劲反弹可能降低了政府短期内加码政策宽松的可能性。鉴于近期央行的政策基调一贯相对谨慎，我们现在认为年内下调存款基准利率的可能性很低。同时，考虑到央行可能更倾向于使用定向工具，我们认为年内全面降准的可能性也有所下降，不过央行可能仍会在年内进行定向降准（规模相当于全面降准 25 个基点）。此外，我们预计央行还会在年内下调 MLF 利率至多 5-10 个基点（此前预测为下调 10-20 个基点）。

图表1: 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指标预测

（%）	2019	2020	2021	实际GDP 季度同比增速	
	实际值	瑞银预测	瑞银预测	瑞银预测	
实际GDP增速	6.1	2.5	7.6	Q120	-6.8
固定资产形成	6.4	3.2	6.0	Q220	3.2
消费	6.3	1.4	8.9	Q320E	5.5
净出口（对GDP的贡献）	0.3	0.6	-0.1	Q420E	6.0
经常账户占GDP的比重	1.0	2.2	1.9	Q121E	18.7
				Q221E	7.0
CPI增速（均值）	3.0	2.5	2.1	Q321E	4.3
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年末）	1.5	1.5	1.5	Q421E	3.6
10年期国债收益率（年末）	3.2	2.8	3.1		
整体信贷增速（调整后社融）	11.0	13.8	11.0		

来源: CEIC, 瑞银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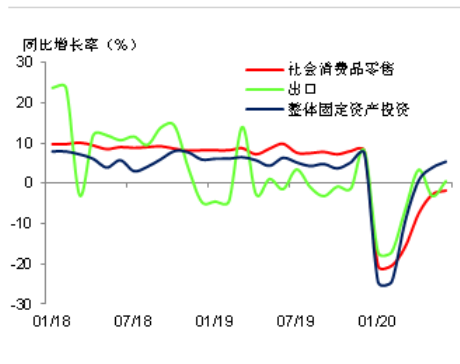
● 内需好转和出口稳健推动二季度 GDP 增速大幅反弹

随着经济活动逐步恢复常态，二季度内需大幅反弹，拉动实际 GDP 同比增速超预期反弹至 3.2%（瑞银估算季调后环比年化反弹 59%）。二季度整体固定资产投资由一季度的同比下跌 16% 转为同比增长 3.6%，其中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均在疫情过后大幅反弹（均同比增长 8%），而制造业投资依然弱于去年同期。随着企业复工复产、出行限制解除，消费也逐步回暖。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跌幅由一季度的 19% 收窄至 4%，不过餐饮销售依然深陷同比下跌。二季度最明显超预期的经济活动是出口。尽管疫情和人员/货物流动的限制拖累全球经济大幅收缩，但二季度中国整体名义出口额与去年同期水平大致相当。主要产品中防疫物资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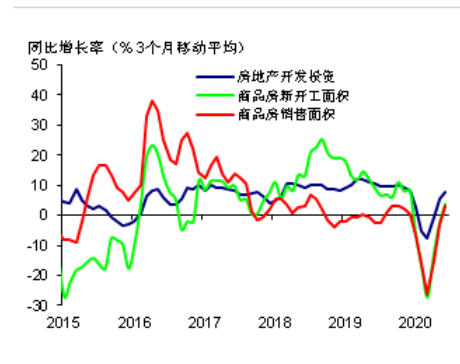
口跃升，电子产品出口也较为强劲，二者抵消了消费品（例如鞋、箱包等）出口的大幅下跌。受益于国内产能快速恢复、供应链韧性较强，二季度中国在全球出口的市场份额也有所增加。

图表2: 二季度整体经济大幅反弹



来源: CEIC, 瑞银预测

图表3: 房地产活动也明显好转



来源: CEIC, 瑞银预测

● 下半年整体经济有望继续回暖

如果国内疫情不会再次大规模爆发，以及即便部分地区疫情出现反复，也能像北京一样有针对性的快速加以遏制，那么下半年国内消费应会进一步改善。我们认为一些目前恢复相对滞后的行业（比如餐饮、国内旅游、线下娱乐等）也有望继续好转，消费者可能增加在体育/健身、医疗保健、日用品、教育、电信服务和公共事业方面的支出。另一方面，受益于大规模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以及建设活动进一步回暖，我们预计下半年基建投资还会进一步走强。虽然居民的购房意愿走弱，但受益于房贷条件放松、利率下降，地方政府边际放松政策，以及近期的土地和户籍改革，下半年房地产活动有望在二季度的大幅反弹后继续温和增长。此外，随着其他主要经济体活动限制逐步放松，外需也有望改善，出口应会继续保持稳健，不过其他国家/地区生产逐步恢复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出口反弹的幅度。

● 上调 2020 年实际 GDP 增速预测至 2.5%

鉴于二季度 GDP 增速反弹幅度超预期，我们将 2020 年全年实际 GDP 增速预测从此前的 1.5%上调至 2.5%（假设国内疫情不会再次大规模爆发）。考虑到大部分经济活动已基本恢复常态，虽然整体经济还有望进一步回暖，但三四季度 GDP 环比增长势头可能会明显减弱。不过，随着国内消费转为正增长，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继续保持稳健，即便环比增速大幅放缓，下半年实际 GDP 同比增速也应能反弹至 5.5-6%。此外，鉴于二季度贸易活动较为稳健，我们同时上调了全年进出口增速预测（图表 4）。同时，考虑到近期南方洪灾的影响和整体经济反弹超预期，我们将今明两年 CPI 增速预测分别小幅上调至 2.5%和 2.1%。



图表4: 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指标新旧预测对比

(%)	2019	2020		2021		实际GDP季度同比增速		
	实际值	旧预测	新预测	旧预测	新预测	旧预测	新预测	
实际GDP增速	6.1	1.5	2.5	7.5	7.6	Q120	-6.8	-6.8
固定资产形成	6.4	2.5	3.2	6.4	6.0	Q220	0.6	3.2
消费	6.3	0.1	1.4	8.8	8.9	Q320E	5.1	5.5
净出口（对GDP的贡献）	0.3	0.8	0.6	-0.2	-0.1	Q420E	5.5	6.0
经常账户占GDP的比重	1.0	2.4	2.2	1.9	1.9	Q121E	17.5	18.7
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	3.0	3.0	2.9	2.7	2.7	Q221E	8.5	7.0
美元计出口增速	-0.8	-8.0	-3.5	12.0	10.0	Q321E	3.8	4.3
美元计进口增速	-2.4	-10.5	-4.5	16.0	12.5	Q421E	3.2	3.6
CPI增速（均值）	3.0	2.4	2.5	1.9	2.1			
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年末）	1.5	1.25	1.5	1.25	1.5			
10年期国债收益率（年末）	3.2	2.8	2.8	3.0	3.1			
整体信贷增速（调整后社融）	10.9	13.8	13.8	10.7	11.0			
USDCNY（年末）	6.95	7.0	7.0	7.0	7.0			

来源: CEIC, 瑞银预测

房地产市场的表现也可能比我们此前预计的更为稳健。虽然一季度房地产销售和建设活动大幅走弱,且在4月进行的中国住房调查显示当时居民购房意愿较低,但近期数据表明房地产销售和建设活动都明显好转。虽然中央层面依然要求控制房价,且深圳房地产政策在市场出现过热迹象之后也有所收紧,但我们认为房地产市场会间接受益于整体货币信贷政策宽松,全局性的房地产政策也应不会被明显收紧。基于此,虽然疫情对部分地区的劳动力市场造成了较大冲击,但整体经济复苏和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意味着房地产市场全年的表现可能会强于我们此前的预期。我们现在预计今年房地产销售和新开工均同比微跌1-3%（此前预计房地产销售下跌5-7%,新开工下跌4-6%）,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至3-5%（此前预计放缓至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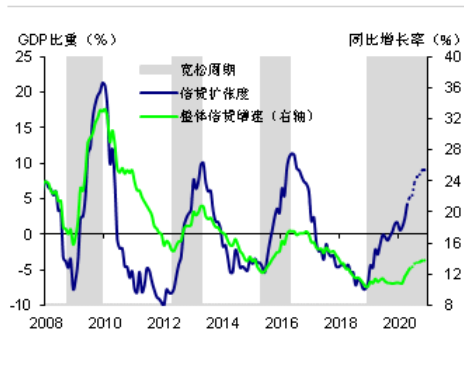
● 下半年政策应会继续保持宽松,但存款基准利率应不会下调

虽然二季度整体经济大幅反弹,但鉴于经济活动仍未完全恢复常态、劳动力市场依然承压,且未来不确定性犹存,我们认为下半年宏观政策应会继续保持宽松。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债券应会按计划发行,且政府可能会利用多渠道保障融资,推动基建投资进一步走强。货币政策方面,政府应会继续鼓励银行加大信贷投放、鼓励企业债发行,整体信贷增速有望从6月的12.9%进一步反弹至13.8%。此外,资管新规过渡期的延长也应有助于避免影子信贷规模的大幅收缩。不过,二季度经济的强劲反弹可能降低了政府短期内加码政策宽松的可能性,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可能会维持目前政策的宽松基调不变。鉴于近期央行的政策立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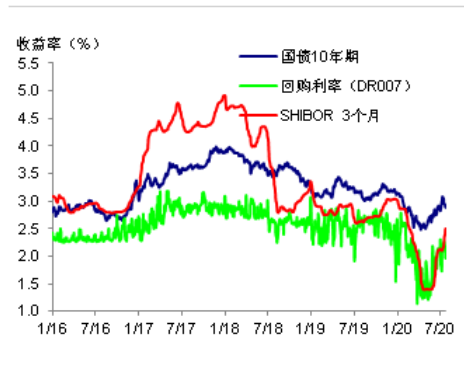
贯相对谨慎，我们现在认为年内下调存款基准利率的可能性较低。同时，考虑到央行可能更倾向于使用定向工具，我们认为年内全面降准的可能性也有所下降，不过央行应仍会在年内定向降准（规模相当于全面降准 25 个基点）。此外，我们预计央行还会在年内下调 MLF 利率至多 5-10 个基点（此前预测为下调 10-20 个基点）。

图表5: 年底整体信贷增速有望小幅升至13.8%



来源: CEIC, 瑞银预测

图表6: 由于近期央行的流动性操作相对谨慎，6月以来债券收益率和银行间利率均有所上行



来源: CEIC, Wind, 瑞银预测

● 预测所面临的风险

我们的预测所面临最大的下行风险来自全球及/或国内疫情再次爆发、导致经济活动再次受限（不过限制的严格程度应不及 3-4 月份），进而拖累相关国家/地区的经济。此外，中美关系紧张态势升级（包括美国收紧对华科技出口限制等）、供应链存在脱钩压力，以及企业利润前景疲弱，这些因素可能会拖累企业资本开支意愿，令贸易和制造业活动承压。悲观情形下，下半年整体经济的反弹可能会弱于预期，全年实际 GDP 增速可能放缓至 2% 以下。在此情形下，货币信贷政策可能会在更长时间内保持宽松，MLF 利率下调的可能性也会更大。另一方面，如果疫情没有恶化，全球经济活动逐步回暖，则内需和出口反弹力度则可能超出我们基准情形。房地产活动的表现也可能比我们目前预期的更为稳健，进而提振消费和建设活动。在上述乐观情形下，今年实际 GDP 增速有望超过 3%。

[Top](#)

**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我们的客户——
提升竞争优势，共同创造持续长远的收益**